

# 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与龟兹密教<sup>\*</sup>

杜斗城 任曜新

龟兹密教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20世纪初问题提出，近百年的时间，学术界对龟兹曾有密教流行，尤其早期有杂密思想的存在和影响的结论，几乎达成一致。但在论据和论证中却始终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直到季羨林的《龟兹之密宗》将中原文献与西域佛教考古结合起来，从西域出土文献资料出发，提出极具权威的证据。但是季羨林的论文也只是说明7至9世纪时龟兹有密教流传，属于纯密阶段。关于3至7世纪的龟兹早期密教（杂密）流传情况学术界仍然没有确定的证据。本文回顾了这一过程，并从新疆库车佛塔出土的4至6世纪梵语婆罗谜文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的角度提出龟兹早期杂密流行的新证据。

关键词：鲍威尔写本 《孔雀王咒经》 龟兹 密教

作者：杜斗城，1951年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曜新，1984年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

从20世纪初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之第五章《龟兹国之佛教》中提出龟兹流行密教以来，龟兹密教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并被认为是研究龟兹佛教历史不可或缺的课题。如果龟兹佛教流行密教的问题得到论证解决，是龟兹乃至西域佛教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sup>①</sup>从20世纪初到现在，学术界对龟兹有密教流行，尤其早期有杂密思想的存在和影响的认识，几乎达成一致。

此观点最早是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中提出。现将其观点较集中的一段话引用如下：

上文述尸梨密多罗条时，吾人曾谓龟兹之密教似亦甚发达，今观罗什所译，有《摩诃般若波罗密大明咒经》、《孔雀王咒经》、《善信摩诃神咒经》三部，皆秘密部经典，则当时龟兹之密教似尚流行也。其后，密教是否继续通行，虽属疑问，然至唐时仍有密教经典二部由龟兹传入者，此即住居龟兹国城西门外莲华寺之勿提提屏（莲华精进）所译之《十力经》（据《宋高僧传》卷三），与龟兹沙门若那传授于崇福寺僧普能之《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据《续藏》第一样第三套第四册），由此观之，唐时龟兹及其他西域诸国之佛教，似颇受

<sup>\*</sup> 本文获得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疆塔里木盆地佛教窣堵波建筑形制及功能研究”（12YJCT30007）、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项目资助。

<sup>①</sup> 霍旭初《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中华佛学》第3卷第1期，台湾，2000年。

印度勃兴之密教之影响，故既法似颇盛行。<sup>①</sup>

总结其论据，主要是以下几点：

1. 东晋时，帛尸梨密多罗在中原翻译了《大灌顶经》、《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等密教经典和他本人擅长咒术；
2. 姚秦时，龟兹出生的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了《摩诃般若蜜多大明咒经》、《孔雀王咒经》、《善信摩诃神咒经》；
3. 唐代龟兹莲华寺僧人勿提提犀鱼翻译了《十力经》；
4. 唐代龟兹沙门若那在长安崇福寺传授《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

此论一出，随后有不少学者附和引用，沿用此说，甚至论据也悉数照搬。<sup>②</sup> 据本文统计，随后的相关论文在论述时只增加以下几条新论据：

1. 《贞元新定释教录》卷 14，唐阿质达霰于西安译出《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
2. 法月三藏至龟兹，直月使令持梵本大乘《月灯三摩经》七千偈，历记达一万偈、瑜伽真言五千偈等。后于长安译出方术医方《梵夹药草经》；直月随师译语。<sup>③</sup>
3. 帛远译《无量破魔陀罗尼经》、《枝特陀罗尼经》。<sup>④</sup>
4. 十六国以神异著名的和尚佛图澄“善诵神咒”，本姓帛，可能是龟兹人。<sup>⑤</sup>

以上研究，论述依据都是汉文佛教文献中的传记和佛经目录中的材料。

近年来又有学者从龟兹壁画里寻找密教的材料。代表者是朱英荣的《龟兹石窟研究》中的《密教与克孜尔千佛洞密教画》。其论据主要是以下三点：

1. 第 17 号窟东甬道坐壁的摩诃毗卢遮那佛像；
2. 第 178 号窟前室东壁的摩利支天像；
3. 第 178 号窟前室西壁的那罗延天像。

李瑞哲在其《龟兹石窟与龟兹佛教研究》一文中，又增举克孜尔石窟第 189 窟和第 198 窟的大自在天像也属密教图像。<sup>⑥</sup>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许多学者研究龟兹库木吐拉石窟中有很多密教形象。<sup>⑦</sup> 但这些都属于 7 世纪唐王朝对西域进行管辖后从中原西传至龟兹的汉地佛教系统，不属于龟兹本地密教流传问题，因此本文不再涉及。

## 二

但是，霍旭初先生在 1998 年 9 月召开的“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首次谈及《龟兹流行密教考辨》，又于 2000 年发表《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从汉文佛教文献和龟兹石窟壁画两个方面，从资料论据和论证方法，集中对上述有关龟兹密教研究

① 羽西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 年 12 月，第 273—274 页。

② 魏长洪《西域佛教史》，东初《龟兹国之佛教》，周菁保《龟兹佛教文明》，李进新《佛教与龟兹》，均载张国领、裴孝曾主编《龟兹文化研究》第 2 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 月。

③ 东初《龟兹国之佛教》，载张国领、裴孝曾主编《龟兹文化研究》第 2 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17 页。

④ 同上，第 17 页。

⑤ 魏长洪《西域佛教史》，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第 35 页。

⑥ 李瑞哲《龟兹石窟与龟兹佛教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9 年 5 月，第 168 页。

⑦ 刘松柏《库车古代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敦煌研究》1993 年第 3 期；李瑞哲《龟兹石窟与龟兹佛教研究》。

的论据论证进行了考证辨析，认为上述论据和论证都“是有偏颇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sup>①</sup>其主要理由是：

1. 帛尸梨密多罗在中原只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他也不一定是龟兹人；
2. 经现代佛学者勘校，鸠摩罗什并没有翻译那些经本；<sup>②</sup>
3. 勿提提屏鱼翻译的《十力经》与小乘《增一阿含》卷42《结禁品》为同本，是小乘戒律类，不属于密教经典；<sup>③</sup>
4. 唐代龟兹僧若那在长安授于崇福寺普能《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并不说明龟兹本地有密教传播；
5. 克孜尔第17窟所谓毗卢舍那佛没有定论，克孜尔178窟的摩利支天实际是鸠摩罗天；他们是原始佛教时期就形成的护法神，不能因为这些天神被后来的密教突出尊奉，就把所有出现这些天神的艺术造像都归属于密教；这种“从克孜尔石窟壁画里考订的几个所谓的密教壁画，都是用抽出个别形象的方法，加以主管的臆断，因而是不可信的。”<sup>④</sup>

通过上述辨析，霍旭初总结出目前龟兹密教研究的资料论据和论证方法存在的几个问题：

1. 学者们在研究龟兹佛教时，主要是依靠汉文文献资料，并且也没有认真研究历代各种佛教目录的形成历史和存在问题，没有对这些汉文佛教文献进行精审勘误研究，只是简单地抄录前人著述，不探其究竟，以讹传讹；龟兹流行密教资料依据的差误，因此而生；
2. 利用龟兹石窟壁画进行研究，无疑是正确的途径。但学者们为了说明问题，孤立地看一个形象或一个局部，将其抽出来加以臆断，而不是从龟兹佛教历史背景、石窟整体关系等全面考虑，因此容易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其结论也是不可取的；
3. 关于龟兹僧人到中原翻译佛经，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僧人的出生地也流行着这种经典或相关思想，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将某个龟兹僧人在中原翻译了某种密教佛经，就简单地推出僧人的出生地龟兹有密教流行，这必然会得出偏颇的结论；因此上述论据也就无法让人信服。

霍旭初文中承认“不是认为龟兹本地佛教没有密教和密教的影响。密教虽然是佛教的最后阶段，形成于7世纪。但早期的‘杂部密教’思想孕育的时代较早，且这些思想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大乘佛教甚至部派佛教时期就有萌芽。当大乘佛教传入龟兹时，也可能某些带有‘杂部密教’成分的想象影响过龟兹”。<sup>⑤</sup>

至此为止，龟兹密教研究似乎走入一种尴尬境地。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基本都认同龟兹有密教流行，但该采用什么论据和方法进行论证，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一大难题。霍旭初在文中也提到了他认为应该采取的思路“研究西域或龟兹佛教，必须将中原文献和西域佛教考古结合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不少探险队都来过新疆，掠取了大量的佛教文物。国外一些学者作过科学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应该成为研究龟兹佛教的重要参考”。<sup>⑥</sup>吕澂先生也指出“早年，日人羽溪了谛著有《西域之佛教》，……他的研究方法，是采用‘逆转’法，即从中国内地的资料去研究西域，而不是从西域本身的资料进行研究，未免有所不足。”<sup>⑦</sup>

2007年，季羨林先生《龟兹之密宗》一文发表，打破了龟兹密教研究现有的僵局。他利用近百年前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龟兹发现的编号为M777-1, 2, 3的残卷和编号为FM34, 1和

① 霍旭初《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中华佛学》第3卷第1期，台湾，2000年。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9月，第208页；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702页。

③ 霍旭初还另撰文对《十力经》的内容和成书年代、入藏时间等进行了专门考证。参考霍旭初《唐代龟兹僧勿提提屏鱼汉译〈十力经〉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④⑤⑥ 霍旭初《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中华佛学》第3卷第1期，台湾，2000年。

⑦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8月，第11页。

498, 2 的两个残片, 通过对这些用梵文和吐火罗文 B 写成的密教残卷进行详尽研究, 从而确定龟兹有密教流行。

季羨林《龟兹之密教》, 即是“将中原文献和西域佛教考古结合起来”, “从西域本身的资料进行研究”, 对龟兹古代存在密教这个问题提出了“极具有权威性的, 是无法反驳的”<sup>①</sup> 证据, 为解决龟兹有密教流传却难以论证的难题提供了示范。

但根据季羨林研究, 这批文书的年代“据 Lévi 的意见, 大概在 7 世纪至 9 世纪之间。……此时正是印度密宗金刚乘形成的时候, 也是从印度派出密宗和尚道中亚一带一直到中国宣传密宗的时候。8 世纪到中国来的金刚智和不空就是著名的例子。”<sup>②</sup> 换言之, 季羨林的论文也只是说明 7 至 9 世纪时龟兹有密教流传, 属于纯密阶段。至于 3 至 7 世纪的龟兹早期密教(杂密) 流传情况又是如何呢? 可以说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本文将从新疆库车佛塔出土的 4 至 6 世纪梵语婆罗谜文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的角度提出新证据。

### 三

鲍威尔写本(The Bower Manuscripts) 是 1889 年底由库车一些觅宝人在库车库木吐拉石窟附近的一座佛塔中挖掘出后, 于 1890 年 3 月被在库车逗留的英属印度第 17 孟加拉骑兵团(17<sup>th</sup> Bengal Cavalry) 中尉哈密尔顿·鲍威尔(Lieutenant Hamilton Bower, 1858 ~ 1940) 购买下的一批古代梵语、婆罗谜文写本的总称。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莱(Bodleian) 图书馆。关于鲍威尔写本的出土时间、出土地点以及鲍威尔写本在发现之初的转手经过和研究情况, 王冀青曾研究考证。<sup>③</sup> 他认为“鲍威尔写本的发现, 是近代新疆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从此改变了国际中亚考察活动的中心”。<sup>④</sup> 近代中国新疆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同时也是鲍威尔写本的主要研究者之一的英籍德裔印度学家奥古斯都塔斯·弗里德里克·鲁道尔夫·霍恩勒(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 1841 ~ 1918) 也曾指出“鲍威尔写本的发现及其在加尔各答的刊布, 发动了在东突厥斯坦(新疆) 进行考古学考察的全新运动”。<sup>⑤</sup> 但是近百年来, 对于鲍威尔写本的内容及价值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却一直鲜少问津。<sup>⑥</sup>

鲍威尔写本全部写在桦树皮上, 属于印度波提(Pothi) 形制写本。鲍威尔写本有 51 张桦树皮组成。从内容题材上分, 主要由七个独立的写本组成。前三部分是有关医学的内容, 第四和五部分是关于骰子占卜的内容, 第六和第七部分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有关《孔雀王咒经》的内容。

第六和第七部分是分别写在两种不同尺寸大小的桦树皮上。第六部分主要有 4 张桦树皮组成, 实际内容从第 1 张的背面开始, 到第 4 张的正面结束, 共计 4 张 6 面。第七部分由两张桦树

① 季羨林《龟兹之密教》,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0 卷第 1 期, 2007 年 2 月, 第 6 页。

② 同上, 第 9 页。

③ 王冀青《库车文书的发现与英国大规模搜集中亚文物的开始》, 《敦煌学辑刊》1991 年第 2 期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霍恩勒文库”附新疆考古通信研究》, 《西域文史》第 5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 《敦煌学辑刊》2011 年第 3 期。

④ 王冀青《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霍恩勒文库”附新疆考古通信研究》, 《西域文史》第 5 辑, 第 241 页。

⑤ A. F. Rudolf Hoernle (Ed.), *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893 - 1912, Vol. I, Introduction, p. ii.

⑥ 有代表性的只有陈明在《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等著作中, 从医学的角度对鲍威尔写本前三部分的医学文书进行了相关研究。

皮组成，第1张的正面内容全部剥落，只保存有3面。

虽然这两个部分的尺寸、书写材质的质量、标页方式等都不一样，但其内容的确属于同一文本。<sup>①</sup> 霍恩勒于1897年首次将这两个部分的梵语婆罗谜文文本解读成功，发表在同年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随后，俄国探险家谢尔盖·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于1897年8月在《俄罗斯帝国考古学会会刊》中将霍恩勒释读的内容与梵文佛经进行比对，第一个提出这两个部分的文本是《孔雀王咒经》中的一部分，并且将该部经的梵文全文刊布在文后。<sup>②</sup> 紧接着，1897年12月，英国学者塞西尔·本达尔（Cecil Bendall）在给霍恩勒的明信片中也提到相同的观点。<sup>③</sup> 1907年4月，渡边海旭博士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发表了《与鲍威尔写本一部分相对等的汉文典籍》一文，<sup>④</sup> 将其与汉文大藏经进行比对，进一步确定鲍威尔写本第六和第七部分保存下来的文本就是《孔雀王咒经》的一部分中，其在汉文大藏经中保留有六个汉译本。<sup>⑤</sup> 并提出鲍威尔写本第六和第七部分仅保留了该经很少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均已遗失。1911年5月，霍恩勒研究指出，虽然鲍威尔写本只保留了《孔雀王咒经》中很少的一部分，<sup>⑥</sup> 但是除去一些重复、变化和展开，鲍威尔写本的第六和第七部分恰好保留了《孔雀王咒经》两个核心的故事内涵，其中第六部分是关于莎底比丘被蛇咬通过念此咒得解脱的故事，第七部分是孔雀王本生时首次使用此咒的故事。<sup>⑦</sup>

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保存的9面文本总共有2385多个音节。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咒语和繁复的佛名、药叉、龙王、大仙、众生主、地舆等名号。因为本文篇幅和讨论重点的需要，这里并不打算将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所有的文本进行汉文翻译，而只是分别选取两个部分中除去大量咒语和各种名号后，有内容识别性的两面，以霍恩勒的释读文本为基础，参考梵语原文，对其进行翻译，并分别附上僧迦婆罗和义净、不空译本对应的部分。

鲍威尔写本第六部分第1张背面译文（本文作者译，下同）：

如是我闻：曾经佛住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在那时在室罗伐室给孤独园住着一位叫莎底（Svati）的托钵僧，他年少新出家，最近才受圆具足戒，被允许学习毘那耶。当他为众人洗热水澡劈烧火用的木头时，他右脚的大拇指被一条大黑蛇咬了一口，它是从朽掉的木头的圆孔的另一边钻出来。他气绝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翻滚眼珠，撕扯身体。具寿阿难陀看到莎底比丘无意识地躺在地上，完全气绝，口吐白沫翻滚眼珠，询问佛：

僧迦婆罗本对应译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园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名曰娑底。年少新出家。受具足未久。始学毘尼。为众破糞以营澡浴。糞孔黑蛇啗其右脚拇指。毒攻其身。蹙地吐沫。转眼腾视。阿难见其痛苦。往至佛所。具白佛言。<sup>⑧</sup>

义净本对应译文：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于

①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需要从两个部分的抄手、文字、年代等诸多原因进行分析。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故在此暂不展开。

② 《俄罗斯帝国考古学会会刊》，第11卷，1897年8月，第297页以下。

③ A. F. Rudolf Hoernle (Ed.), *The Bower Manuscript*, Vol. II, p. 240.

④ K. Watanabe, 'A Chinese Text Corresponding to Part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pril, 1907, p. 261~266.

⑤ 它们分别是帛尸梨密多罗译本、失佚译本、鸠摩罗什译本、僧迦婆罗译本、义净译本和不空译本。

⑥ 如他所说“整部经的梵语全文印出来有43页长，但鲍威尔写本只占了其中6页”。

⑦ A. F. Rudolf Hoernle (Ed.), *The Bower Manuscript*, Vol. II, p. 241.

⑧ 《孔雀王咒经》，《大正藏》第19册，446c。

此住处有一比丘名曰莎底。年少出家未久。新受圆具学毘奈耶教。为众破樵营澡浴事。有大黑蛇从朽木孔。忽然而出蛰彼比丘右足拇指。毒气遍身闷绝于地。口中煦沫两目翻上。尔时具寿阿难陀。见彼比丘形状如是极受苦痛。即便疾往谒佛所。<sup>①</sup>

不空本对应译文: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一比丘名曰莎底。出家未久新受近圆。学毘那耶教为众破薪营澡浴事。有大黑蛇从朽木孔出。蛰彼比丘右足拇指。毒气遍身闷绝于地。口中吐沫两目翻上。尔时具寿阿难陀见彼比丘。为毒所中极受苦痛。疾往佛所礼双足已。<sup>②</sup>

通过与汉文文本比对可以确定鲍威尔写本第六部分确是《孔雀王咒经》莎底被蛇咬的内容。下面是鲍威尔写本第七部分第 2 张正面译文:

“阿难陀，这个大孔雀王咒经，应该被一个人想起，无论他去村落还是去丛林；无论他是在正路上还是在歧路上；无论他是在王侯之中还是在强盗之中，或是在火中，或是在水中，或是在敌手中，或是在会众中，或是在争辩中；无论他是被蛇咬，或饮用了任何毒药或在各种危险同时存在时；他也必须想起它在由于风或胆汁或痰的失调或这三种体液一起失调时所引起的四百零四种疾病时，或者如果他得了任何其他种类的疾病时，或者当所有不幸一起发生时。因为什么原因这样做？阿难陀，因为一个人原本应该罚死罪，以杖鞭打得解脱；原本应该罚杖打，以手打得解脱；原本应该罚手打，以被骂恐吓得解脱；原本应该罚被骂恐吓，以被谴责得解脱；原本应该被罚谴责，以威慢性的姿势得解脱。无论是什么，他都会得到解脱；他会从所有疾病中得到解脱。阿难陀，这个咒语的字都应该被想起。”

僧迦婆罗本对应译文:

阿难此大孔雀王心。以大孔雀王咒。若入国界至阿兰若。正路邪路诣王宫殿。劫贼鬪诤水火怨恶。及处大众蛇啗饮毒。于一切怖畏应当忆念此咒。若风痰寒热和合。于四百四病若为一病所触亦应忆念。若非意苦至亦应忆念。何以故阿难若人应遭囚系。但以罚而得解脱。若应鞭罚以杖捶解脱。若应杖捶搏耳解脱。若应搏耳瞋骂解脱。若应瞋骂诫勸解脱。若应诫勸不涉言解脱。如是解脱离一切病。<sup>③</sup>

义净本译文:

阿难陀此大孔雀咒王心咒。若复有人欲入聚落应存念诵。或至阿兰若寂静之处。或在正道或行非道。或入王宫劫贼鬪诤水火怨家。及对大众。或蛇蝎等螫为毒所中。诸有怖畏风热痰癘。或三集病或四百四病。若一一病生即应念诵。若苦恼至咸可忆持。何以故阿难陀。若复有人应合死罪以罚物得脱。应合被罚轻杖得脱。应合轻杖骂而得脱。应合被骂诃责得脱。应合诃责战悚得脱。应合战悚自然得脱。一切忧恼悉皆消灭。<sup>④</sup>

不空本译文:

阿难陀。此佛母大孔雀明王心陀罗尼。若复有人。欲入聚落应当忆念。于旷野中。亦应忆念在道路中亦常忆念或在非道路中亦应忆念入王宫时忆念。逢劫贼时忆念。闻诤时忆念。水火难时忆念。怨敌会时忆念。大众中时忆念。或蛇蝎等螫时忆念。为毒所中时忆念。及诸怖畏时忆念。风黄痰癘时忆念。或三集病时忆念。或四百四病一一病生时忆念。若苦恼至时皆当忆念。何以故若复有人。应合死罪以罚物得脱。应合被罚以轻杖得脱。应合轻杖被骂得

① 《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大正藏》第 19 册，459c。

② 同上，416a。

③ 《孔雀王咒经》，《大正藏》第 19 册，448b。

④ 《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大正藏》第 19 册，461c。

脱。应合被骂诃责得脱。应合诃责战悚得脱。应合战悚自然解脱。一切忧恼悉皆消散。<sup>①</sup>  
通过与汉文文本的比对可知，鲍威尔写本第七部分确属《孔雀王咒经》的一部分。

#### 四

《孔雀王咒经》主要讲述的是比丘莎底（Svati）出家未久，为蛇所咬，阿难陀见他痛苦，疾往佛所，佛告阿难陀，有大孔雀明王大陀罗尼（dhārani）（此言咒）有大威力，能灭诸毒。佛说此咒之后，历数诸种神道不能恼害持此咒者。所说诸神，名称之众，可称佛教神团的一次大集合，尤其以民众所信神团为多。经中，佛还告阿难陀说，昔有金曜孔雀王（Suvarnāvabhāsa mayūra - rājñah），居于雪山，诵咒自护。因一时忘诵大孔雀王咒，遂与众多孔雀嫫女游戏山林，被怨家捕获。被缚之时，复诵此咒，遂得解脱。该经的主要作用是疗病、解毒、求雨、消灾去祸等。《孔雀王咒经》作为“五护秘经”之一<sup>②</sup>，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杂密经典。

鲍威尔写本第六和七部分《孔雀王咒经》的年代，根据霍恩勒从文字、语言及与写本其他几部分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确定其属于4世纪。<sup>③</sup>此后，桑德尔（Lore Sander）在《〈鲍威尔写本〉的来源与时代新考》一文中认为其年代应该是6世纪左右。无论哪种观点，鲍威尔写本的年代都无疑是属于4至6世纪龟兹杂密流行的时候。根据鲍威尔写本第六部分第4张正面第六行的文字“敬畏佛所宣称的这个咒，它们可以护佑 Yaśômitra 的幸福。它们可以将他从一切恐惧、一切困难、一切诱惑和一切发热、一切疾病和一切疾病的发作和一切毒中解脱”<sup>④</sup>看出此《孔雀王咒经》的写本是一个叫 Yaśômitra 的人自己或请人为他自己抄写的。写本从库车佛塔的密室中被发现，说明这个佛塔可能是用来纪念那个叫 Yaśômitra 的人和收藏为他而进行的抄经。这充分说明，在4至6世纪，龟兹地区已经有杂密经典《孔雀王咒经》的流行。新疆库车佛塔出土4至6世纪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为7世纪之前龟兹早期密教（杂密）流行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

（责任编辑：黄夏年）

①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正藏》第19册，419c。

② 其它四部是《大随求陀罗尼》、《守护大千国土陀罗尼经》、《大寒林陀罗尼经》、《大护明大陀罗尼经》。

③ A. F. Rudolf Hoernle (Ed.), *The Bower Manuscript*, Vol. I, Introduction, Vol. I, p. xlvii.

④ A. F. Rudolf Hoernle (Ed.), *The Bower Manuscript*, Vol. II, p. 230.